

生产力哲学

——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探稿

胡义成 著



宁波出版社

生产力哲学

——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探稿

胡义成 著

宁波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松见
封面设计:王海明

生产力哲学

——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探稿

胡义成著

☆

宁波出版社出版

(宁波市苍水街79号 邮编:315000)

上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80千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

ISBN 7-80602-215-5/B·2

定价:18.00元

献 给

改革开放二十周年
以及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进一步
改革开放

目 录

第一章 总论.....	(1)
第一节 “经济哲学”界说.....	(6)
狭义界说的缺陷.....	(6)
哲学与经济学关系新解.....	(9)
广义经济哲学外延界说	(10)
第二节 研究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的意义	(15)
邓小平论邓小平经济哲学	(17)
异见述评	(27)
在政治经济一体化中思考和解决经济问题:邓小平经济 哲学的长项	(34)
第三节 国内外经济哲学进展和邓小平经济哲学研究简况	(40)
库普曼资源配置理论是当代市经济哲学研究中的硕果	(42)
西方的“经济学假定大战”及布劳格的证伪主义	(50)
对反对计划经济的哈耶克经济哲学合理因素应当借鉴	(55)
市场机制研究中的西方文化唯物主义	(56)
原苏联和东欧经济哲学的贫困	(61)
国内外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研究简况	(62)
第四节 “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 ...	(66)

不能把《资本论》逻辑起点搬用于邓小平经济哲学	(67)
邓小平对“生产力标准”的论述及其启示	(70)
“生产力标准”是邓小平经济哲学的逻辑起点	(74)
邓小平经济哲学在逻辑起点上对《资本论》的根本性突破	(90)
效率和公平：“生产力标准”实施的辩证法	(95)
不能片面理解“生产力标准”	(98)
第五节 本书内容安排	(100)
“生产力标准”的真理—价值二重性	(101)
对本书撰述形式的某些说明	(104)
本书书名略解	(106)

第二章 生产力标准高于人权标准——邓小平经济哲学对 传统政治经济学否定市场经济取向的超越

(111)

第一节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判据是主体 人道主义	(112)
库普曼的一般“理论结构式”	(113)
对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理解的两种极端倾向	(115)
经典政治经济学以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原因	(117)
经典政治经济学以主体人道主义作为价值判据的佐证	(118)
马恩关于其人道主义价值判据的言论	(119)

第二节 首先用生产力标准审视市场经济——邓小平对 《资本论》失误的超越	(123)
从“布雷学案”说起	(124)
当代经济学对市场功能的科学显示	(127)
《资本论》是怎样审视市场经济的？	(130)
转向市场经济：邓小平在价值判据上的重大突破	(137)

余论：回视邓小平关于人道主义论争的意见	(141)
第三节 马恩“自由王国”论反思	(143)
西方学者沿袭马克思看待市场经济与自由的关系	(143)
“自由王国”论的背景	(145)
“自由王国”论回视	(146)

第三章 从实践标准向生产力标准的跃迁——邓小平生产力哲学对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推进和超越

(149)

第一节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究竟是什么	(150)
社会主义：本质决定根本任务	(150)
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决定中心任务	(154)
从“实践哲学”跃迁到“生产力哲学”	(155)
迎接知识经济	(157)
第二节 真理标准：邓的创新	(159)
“猫论”上的歧异	(160)
“阶级斗争为纲”背景上的“实践哲学”只能成为“生产力哲学”的反对者	(161)
“实践哲学”离开生产力标准会否定市场经济	(163)
离开生产力标准的实践标准也可能滑向实用主义	(164)
“生产力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必然归宿	(165)

第三节 再论生产力标准即实践标准的社会化展开

(166)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本质上就是社会生活	(166)
--------------------------------	-------

“生产力标准”就是“实践标准”的社会化展开	(175)
-----------------------------	-------

第四节 用“生产力标准”衡评当前中国改革中的某些“热点”问题

(179)

“阶级斗争为纲”不应再来·····	(179)
不能再让“平等第一”回潮·····	(193)
以何人为中心? 以人的什么为中心? ·····	(201)

第四章 大胆汲取当代国外经济学成果——邓小平经济哲学与当代国外经济学的某些契合····· (208)

第一节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当代国外经济学的批判借鉴····· (209)

参照系之一: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	(210)
参照系之二:日本学者的成果 ·····	(212)
参照系之三:诺奖获得者的成果 ·····	(214)
完善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218)

第二节 邓小平经济理论与西方“市场、计划中性论”·· (220)

鸟瞰·····	(221)
数理经济学洛桑学派的开拓·····	(222)
西方数理经济学在“中性论”上的贡献例示·····	(224)
诺奖获得者西蒙对“中性论”的贡献·····	(229)
西方学者维护市场经济批评计划经济的合理方面·····	(230)
西方“计划中性论”简议·····	(234)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与“阿罗定理”····· (236)

“阿罗定理”略述·····	(236)
“阿罗定理”的多重含义·····	(238)
有关“阿罗定理”的最新动向·····	(241)

第四节 对邓小平理论和西方当代经济理论比较研究中的 一些经济哲学问题的理解····· (242)

第五章 中华龙舞“红色股”——邓小平股份制理论的经济哲学阐释和当代中国国企改革····· (255)

第一节 邓小平的股份制理论和中共十五大的“股份制

社会主义”	(256)
第二节 为什么股份制是“中性”的?	(258)
股份制演进四时段	(258)
股份制发展规律:“两权分离”日益强化	(261)
“两权分离”日益强化是生产力发展所致	(267)
“股份制中性论”何以成立?	(269)
第三节 “股份制社会主义”透视	(272)
逻辑透视:股份制财产占有的社会化大趋势	(274)
历史透视:当前的控股权问题	(285)
“两论互补”	(290)
第四节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方略选择的中国特色和科学性	(295)
中国实行“股份制社会主义”的特有推力	(297)
对国内外一些诤难的述评	(302)
搞股份制社会主义目前重在防“左”	(309)
第五节 邓小平理论对《帝国主义论》的超越	(312)
曾作为“修正主义”的“股份制中性论”	(313)
被超越了的《帝国主义论》	(321)
第六节 股份制:邓小平放眼寰球	(330)
“股份制社会主义”在美国	(330)
“股份制社会主义”在欧洲	(341)
后记	(348)

第一章 总 论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商君书·更法》

治者所道富也，治而未
必富也，必知富之事，然后能
富。富者所道强也，而富未必
强也，必知强之数，然后能
强。

——《管子·制分》

我们站在世纪之交。

前面，有古人；后面，有来者；旁边，有同志者，也有异志者；自己心中，也常有“两军”相搏。“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不。

回首之际，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神州大地，生我养我之乡，先是战火狼烟，后是“斗”字当头，元气大伤，民贫穷而国不强；到了临近世纪末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穷坏了，也醒悟了，面对隔壁邻舍“富的富”，“发的发”，面对“苏联老大哥”与我们一样爱打爱斗不爱建设而落伍灾变的事实，铁下心搞建设，而且建设绩效实在不错，“小康路近”，好生喜人。因此，我们还来不及“念天地之悠悠”，也似乎不必要“独怆然而涕下”。但当此两个千年两个百年之交，我们也确乎需要回思上一个百年的经验教训，为下一个百年国强民富作好充

分的精神筹划。

回思,有各种各样。

在哲学的层面进行回思,常常被庸人(包括一些持有大学乃至研究生文凭但“匠”气十足者)视为“迂腐”、“空泛”,但它如果真正摸准了上一个世纪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脉搏,在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扬其精华而弃其褊躁,为来日中国的国强民富提供一个真正够格的精神导向,那么,这种哲学反思就是最深刻的,也是目下中国人的当务之急。确实,被视作以“实践理性”导引行动的国人,在数百年落后的氛围中,进行真正的哲学反思,为自己目前和尔后的渐进改革寻找合理性和正当性的理性支撑,实在是太必要了。“生物学家赫胥黎指出一百种里有九十种以上的生物皆有倾向于‘模式维持’之倾向,其结果是每十二种生物里就有十一种在地球的表面上绝种。历史上许多文化的死亡,其可能的原因之一也许即在过分强化传统、认同而减弱了适应、变革之能力”(台湾金耀基先生言。参见罗荣渠主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页)。

早在1994年,我国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就提出,我们应当对二十世纪中国进行“回顾总结”,“做好这件工作很有意义,它可以对下世纪起借鉴、引导作用。现在总结正是时候”(《社会科学报》1994年7月7日)。在此之前,八十年代,我国一些留外学生也曾针对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绕不开的一些深层矛盾,提出导引经济改革的中国经济学应首先在哲学层面反思自己,包括从根本上弄清楚公有与私有、市场与计划和生产目的等经济哲学基本问题,才能成为真正促进中国改革的精神力量。在这里,世纪性回眸,已经被聚焦于经济哲学。经济建设是社会的根基,也是眼下中国一切事情的中心;对中国进行世纪性的哲学回眸,以经济哲学为聚焦点,合情合理。而中国改革的实践,也使这一聚焦愈见集中鲜明。中共十三大和十四大提出和细化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就与我

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有关结论格格不入；中共十五大在邓小平同志股份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通过股份制把国有大型企业改造成现代企业的设想等等，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中也很难找到充分的理论支撑。显然，问题只能首先放在经济哲学的层面才能获得应有的解决。可以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发展，世纪之交的历史际遇，已把经济哲学推到了中国进行世纪性回眸的聚焦中心。

改革开放中我国理论界的争鸣论战也时起时伏。为什么一些很有名气的政治经济学家，面对日益深化的改革实践，往往出于“好心”但却甘当改革的理论“对立面”？为什么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在经济理论领域，人们往往很难取得共识？从理性的深层面看，病根子首先在传统的经济哲学上。中国论界围绕改革开放的二十年反复争论，实质也是新旧经济哲学的较量。中国当代主流经济哲学的解构和重建，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一个“瓶颈”。对中国的世纪性反思，显然也只能首先在这里展开。

当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大转折时，有识之士总是敏锐地悟到在哲学层面反思以往价值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必要性；哲学也在这个时段成为开拓新时期的最深沉嘹亮的号角。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是哲学的骄傲，其他学问难以取代。如今，当苏美冷战被尘封为往史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当西方大国也在原子个人主义和纵欲无度的生活模式中气喘吁吁并急呼价值观改革时，这一哲学的“历史节目”同样再一次上演着。西方战略思想家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务卿）在近年出版的书中，便明确提出，前苏联的消亡不等于西方大国的全盘胜利，在西方长期泛滥的自私自利和享乐主义已经严重影响着社会平稳发展，迫使西方国家必须首先从价值观的层面反思启蒙时代以来的哲学，重建自己新型的信念体系（参见布氏《大失控和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在此之前，美国著名未来学家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也写道：“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经济生存

于其中的文化价值体系”(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310 页)。就凸现当代人在哲学(包括价值观)层面反思经济生活和经济理论的必要性而言,贝尔之言也有相当合理性。当此时代性质巨变和知识经济君临之际,无论对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导向而言,或者对新的经济理论的催生而言,哲学的本性决定了它的确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

也许是由于文化特点所致罢,近代和当代西方有水平的经济学家在思考和研究时,大体均从经济哲学开始自己的理性航程。不仅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始发港的,而且斯密的《国富论》也是以其伦理学名著《道德情操论》作为理论互补物的。本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王牌经济学家”凯恩斯,虽被看作“经济学贵胄”,但他也承认“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要更有力量”(转引自林德贝克《新左派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27 页)。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奥肯也公开表示对哲学的“敬畏”(《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3 页)。在当代,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更几乎个个都是首先在经济哲学上独树一帜的哲人,很少有全部使用他人经济哲学体系而自己只从事逻辑展述和应用者。其中,1978 年获得诺奖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不仅在著述中以阐发人们认识的“理性有限”而获巨大声誉,而且前不久还在美国某大学的心理学系工作(参见经济学消息报社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专访录》,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6 页);1974 年获诺奖的美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对完全计划经济模式的摧毁性理论打击,也不是首先在经济学领域展开的,而首先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实施的(参见哈氏《价格制度是一种使用知识的机制》,收于李兴耕等主编《当代国外经济学家论市场经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当代经济学的哲学化已经是越来越强大的学术潮流,难怪我国有位学者甚至以为经济哲学已经是“第四代经济学”

的主体了(参见《理论信息报》1989年11月27日所刊《第四代经济学》)。

与国外经济学越来越哲学化的趋势相比,我国以前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无视新的哲学思考。一些研究者往往以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经济哲学,盲目阐发和复述它。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忽视、淡视乃至贱视哲学者,却大有人在。由于哲学在中国曾经多年被一些人作为政治运动的婢女,所以,一些缺乏应有哲学修养的人们便往往无分析地把所有哲学看成“荒唐”的代名词,根本不愿意涉足哲学;一些不清楚经济学与哲学关系的经济学家,也害怕哲学“插足”经济学会使后者“堕落”,于是,他们实际上僵定于过时的经济哲学体系而对当前的改革开放横加责难。我国南方一位年轻学者,在批评关于“哲学从来没有影响过物理学”的片面见解以及某物理学家对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先生重视哲学的不以为然时,曾指出:“这一点在我们当前的博士生导师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博士生导师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王东华《新大学人》,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86页,第92页)。此话说得有些过头,但对我国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研究而言,也不全是空穴来风。仅从重建中国这两门难以缺少的科学而言,突出经济哲学研究的意义,也就成为一种学理的必然。

这样,一方面,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历史地凸现出了经济哲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迎合着这种实践的和理论的大趋势,在我国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均出现了对当代中国经济哲学研究及转轨的深情呼唤,于是,在近几年,中国经济哲学研究终于启动起来了。哲学界有人把经济哲学研究看作当代中国哲学通向现实的一个主渠道,有人认为它是当代中国哲学摆脱抽象主客体模式导致的贫乏状态而走向学术繁荣的一大载体,并推出了自己的成果;经济学界则在一些著名学者的带领下,也迅速从经济哲学的层面出发,为

改革开放提供着深层理论支持。形势令人乐观。作为引玉之砖,本书正是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抛”出的。

第一节 “经济哲学”界说

经济哲学研究的展开,要求人们对其性质和研究对象以及范畴系列等基本问题给出界说。

由于观察和思考的角度不同,在我国,目前经济哲学实际上被界说为广义、狭义及介于二者之间者三种。简而言之,广义的经济哲学以“经济观”为研究对象,注目于社会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一般经济理论中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狭义的经济哲学仅仅指严格意义上的当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的交叉,它区别于“经济的哲学”,只是系统地、严格地对当代经济学的前提、意义、基本概念作现代哲学阐释的学科;介于二者之间的经济哲学又分成色彩浓淡配合不同的许多见解(参见1994年8月18日《社会科学报》。1997年2月15日《光明日报》等报刊书籍有关讨论文章)。在我看来,由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和学术兴趣各异,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在研究经济哲学时,似可在以上各种界说中任意选择,至少在目前不能强求一律。

狭义界说的缺陷

由于所处文化氛围的关系,学者们易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思考问题;一提起经济哲学,有人便往往易于想到当代学园经济学和当代学园哲学全面而系统的交叉融合,以及它应当有严格的逻辑体系,等等。对此,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许多年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往往太执迷于为现实政治服务了,往往没有自己严密的逻辑体系和理性结构,往往是一堆政治口号和一堆未被辩证把握的学术概念的混合堆砌物,不时令正直的学者为之扼腕。面

对此种陋习,学者们出于学术良知,高标准要求经济哲学的学术品位,无可非议;更何况,理想中的作为纯理论体系的经济哲学,也应当是辩证综合当代经济学和哲学成果的具有严格逻辑体系及理性结构的学术精品。问题在于,无论是对本书的主题而言,还是就哲学本质的思考而言,严格狭义的经济哲学界说是有许多局限性的,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不可作为主流定义的。

这是因为,它几乎忽略了哲学在人们认识经济现象和从事经济活动时的巨大导向和方法价值,把哲学与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的广泛联系仅仅局限在哲学与经济学两个学科交叉的范围内,显然片面。按照这种界定,经济哲学理论和实践的主体只能是生活在大学或研究机构里的理论知识渊博的学者;从事非理论研究工作的人们,其中包括古今中外从事宏观或微观国务活动和经济活动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似乎都要被排除在其主体之外,这当然有偏颇。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哲学除了表现为纯粹理论形态以外,更主要的是表现为芸芸众生的“经济观”,即人们用什么样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对待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包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如何对待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判据看待经济现象,如何把握经济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经济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物,等等。在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态的意义上,古今中外的一切经济活动,包括一切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转轨,也包括经济实体经营中的成败,以及理论家对经济客体的观察和思考,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着某种经济哲学;可以肯定地说,凡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之处,都有经济哲学存在。其中的道理其实也很简单:任何经济活动,都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主要形态而展开的;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离不开作为人的理性之一的社会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导引,亦即都割不断与某种哲学的联系。当然,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很可能许多并不知道哲学为何物,他们也可能压根儿没有想到会与什么哲

学发生关联,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的经济活动与经济哲学无缘;只要这些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有自己的好恶和追求,有自己对经济事务的看法和感悟,那么,这种好恶、追求、看法和感悟等等,实际上就不能不表现着某种经济哲学。至于一些哲学修养水平不低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企业家和理财能手等等指导或从事经济活动,经济哲学在他们身上的体现也就必然更自觉和突出鲜明。还有,任何一个理论家(不仅包括经济学家,而且包括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学者),任何一个文艺家,在面对经济生活进行理论思考和艺术创作时,也都不能不渗透着自己对有关经济活动的评判、好恶且以之作为自己思考和创作的出发点,这也就是某种经济哲学的表现。很显然,在一切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只要经济实践主体和经济理论主体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那么,经济哲学就必然无时无刻不在表现自己。对于经济哲学研究者而言,这种表现在活生生的经济实践中的经济哲学,才是自己首先应予归纳和注目、提升的对象。当然,表现于经济理论之中的经济哲学,也是需要注目的,但是,就经济理论只是经济实践的某种程度上的表象而言,它们也只是实践中的经济哲学的曲折的不全面的反映而已,对它们的注目毕竟不能代替对后者的归纳提升。在这个意义上,广义的经济哲学界说,远比狭义者更接近经济哲学的真义。

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强国富民方面有巨大劳绩或成绩杰出的中外国务活动家们,往往没有留下纯理论形态的哲学或经济学著述,更难有关于经济哲学的纯理论阐说;这些经济哲学大都体现在关于强国富民的言论行动或有关政策举措之中。用狭义的经济哲学界说来衡量,他们的经济哲学往往被排除在研究者视野之外。问题在于,当中外某些杰出国务活动家的这种非纯粹理论形态的经济哲学(特别是其中包含的对于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经济价值观选择的纠偏及重新选择组合)确实导致了可观绩效,但又还